

Durkheim and Saussure: Structuralism Thoughts Compared

Durkheim et Saussure : comparaison des pensées de structuralisme

塗爾幹和索緒爾：結構主義思想比較

Liu Yuanchao

劉援朝

Received 15 May 2007; accepted 20 November 2007

Abstract: Structuralism is the most popular rationalism thought in the current academic field. It originates from the structuralism in linguistics and gradually influences anthropology, literature, philosophy, history, sociology and such humanistic disciplines and it has lai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ost-modernism in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 author noticed that there was structuralism in academic field before linguistic structuralism came up and that was social structural analysis in sociology. The author discussed in detail the structuralism thought of Durkheim, who was the founder of sociology. The author compares his thoughts with those of Saussure and their life experiences and makes the conclusion that Saussure's structuralism thought originated from Durkheim's social structural analysis and was further systemized and developed. Researchers after Saussure further developed Saussure's idea and thus made structuralism a precise and complete rationalism academic thought.

Key words: Durkheim, Saussure, structuralism, social structure, structural analysis, post-structural analysis, schools of structuralism

Résumé: Le structuralisme est un courant de pensée rationnel le plus à la mode du monde scientifique. Provenant du structuralisme linguistique, il s'étend petit à petit dans le domaine de sciences humaine et sociale, telles que l'anthropologie, la littérature, la philosophie, l'histoire et la sociologie, et jette la bas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u post-modernisme. L'auteur a noté que, avant l'élaboration du structuralisme linguistique, il existait déjà la pensée structuraliste – l'analyse de la structure sociale de la sociologie. Il entreprend une analyse minutieuse sur la pensée structuraliste du fondateur de la sociologie Durkheim et établit, du point de vue biographique, une comparaison entre lui et Saussure, créateur du structuralisme linguistique. L'auteur arrive à conclure que le structuralisme de Saussure est né de l'analyse de structure sociale de Durkheim, mais plus systématique et plus strict que celle-ci, et que les chercheurs structuralistes après Saussure développent davantage sa pensée pour faire du structuralisme un courant de pensée rationnel complet et rigoureux.

Mots-clés: Durkheim, Saussure, structuralisme, structure sociale, analyse structurelle, post-structuralisme, école de structuralisme

摘 要： 結構主義是目前學術界最流行的理性主義思潮。它起源於語言學的結構主義，逐漸蔓延到人類學、文學、哲學、歷史學、社會學等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並為當代的後現代主義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基礎。作者在研究結構主義時曾注意到，在語言學結構主義提出之前，學術界也有結構主義的思想，這就是社會學的社會結構分析。作者詳細地分析了社會學的創始人塗爾幹的結構主義思想，並從其生平、經歷與語言學結構主義的創建人索緒爾的學說進行比較後認為，索緒爾的結構主義思想起源於塗爾幹的社會結構分析，並進一步系統化和嚴密化，索緒爾其後的結構主義研究者更加精密地發展了索緒爾的思想，使得結構主義成為一種嚴密而完整的理性主義學術思潮。

關鍵詞： 塗爾幹；索緒爾；結構主義；社會結構；結構分析；後結構主義；結構主義流派

毫無疑問，結構主義是當代學術思潮中最為時髦的思想之一，尤其是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的興起，並在“超越”的名義下反掉了列維·斯特勞斯(Levy Strauss)的法國結構主義，也反掉了斯特勞斯的結構主義賴以存在的布拉格學派的音位理論之後，索緒爾(F. de Saussure)的結構主義便以勢不可擋的趨勢蔓延於人文社會科學各領域，以致有人讚譽索緒爾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而我們知道，在世界學術史上，從來沒有一位語言學大師在語言學圈外受到如此的推崇和敬仰。與此同時，在語言學圈內，索緒爾也受到從來沒有過的批評和指責。語言學界的批評者們指責索緒爾的理論是一種靜止的片面的理論，它只考慮語言的平面結構，而不考慮外界環境對語言系統的影響。由是，在語言學圈內，社會學的語言學——社會語言學備受重視，圈內人士熱烈讚頌社會學的多變數、多因素分析，從而將塗爾幹(Emile Durkheim，國內譯名很雜，有杜爾幹、杜克海姆、杜爾克姆、迪爾凱姆、杜爾凱姆等，塗爾幹是老譯名)——這個已被社會學界遺忘多年的老古董請了出來。

這真是一個奇怪的組合——兩位元學界大師都各自在自己的學術領域受到非議，而在學科以外的領域受到關注和讚揚，而這一切都與結構主義的發展息息相關。

勿庸置疑，結構主義是法語文化區的產物，這從結構主義的代表人物——索緒爾、塗爾幹、列維·斯特勞斯，以及後結構主義的代表人物福柯、德里達、拉康等都是法語學者就可以清楚的體會出來。這絕不是一種偶然的巧合，而是與法國文化有著內在的思想聯繫。如果說，薩特的存在主義代表著法國文化的人文主義（非理性主義）的一面；那麼，結構主義就代表著法國文化的理性主義一面。因此，研究結構主義還是應該從法國文化中尋找答案。顯然這是一個相當大的題目，遠非本文所能承擔。因此本文只討論其中的一個小題目：同為法語作家的索緒爾和塗爾幹的思想比較。

1. 思想淵源與生活經歷

塗爾幹和索緒爾都生活在十九世紀中葉和二十世紀初。那是一個動盪的年代。資產階級的統

治剛剛開始，剛剛退下歷史舞臺的封建主義還不甘心他們的失敗，還在進行著絕望的掙扎，社會生活很不安定。在戰勝了封建統治之後，資產階級的代表拿破崙一方面在法國國內實行集權統治，一方又在和德國（普魯士）爭奪歐洲的統治權。在進行了長達三十年的戰爭之後，法國失敗了，拿破崙被俘，法國又退回了他的六角形邊界。由於法蘭西帝國的崩壞，法國國內政局動盪，短短十幾年內，法國先後三次改換了政府，成立共和國。由於連綿不斷的戰爭和政局動盪，歐洲人文社會科學界充滿了一種悲觀主義的情調。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叔本華的厭世哲學、尼采的暴力論和佛洛德的神經病學說都充滿了悲觀失望的情緒。但是，在遭到巴黎公社嚴重失敗的情景下，馬克思主義者並沒有退縮下來，馬克思主義仍在歐洲大陸廣泛地傳播。

與此不同，由於一系列的發現和發明，歐洲的自然科学界卻充滿了昂揚向上的樂觀主義進取精神。隨著達爾文進化論的傳播，科學家們相信，人類必將依靠科學技術的進步戰勝自然，從而使自然為人類服務。這種樂觀主義精神和理性主義的態度也傳染給人文社會科學，以致出現要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來解剖社會的左拉的自然主義文學流派。

可以說，塗爾幹和索緒爾在他們日後的研究中正是受到了自然科学界的這種樂觀的和理性主義的感染，對他們所研究的社會現象和語言現象採用了類似自然科学家在分析自然現象時處理手法（例如，塗爾幹首先採用了統計分析的方法，為研究社會現象的趨向性指明了道路；同樣，索緒爾對語言線性規律的研究也為結構主義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從而為社會學和語言學的發展開闢了一個新時代。

塗爾幹和索緒爾生活在同一個時代的法國和瑞士。其中，塗爾幹（1858—1917）的一生基本上是在法國度過的，他的整個學術活動幾乎全是在法國進行的，其中只有很短的期間去過德國，可以說，塗爾幹及其流派是法國文化的產物；而索緒爾也與法國文化有著不解之緣。索緒爾（1857—1913）出生在瑞士日內瓦的一個法國人家庭，青年時代，他曾經在瑞士、德國和法國求學，而他的學術生涯是在法國開始的，而後回到了瑞士，終老故鄉。因此，作為同時代人，他們都受到法蘭西文化的強烈影響，他們的學說也被打上

法蘭西文化的印跡。

1858年4月，塗爾幹出生在法國東部的一個名叫艾皮納勒小城鎮的猶太人的家庭。在他幼年的時候他的父親便去世了。在家鄉，他一直讀到了中學畢業，通過了法國全國中學會考，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巴黎聖路易14中學學習，並準備投考巴黎高等師範學院。

1879年，塗爾幹考入巴黎高師，受教於歷史學教師庫朗熱（Fustel de Coulanges）和哲學教師布特魯（Emile Boutroux）門下。這兩位教師的思想對塗爾幹後來社會學思想的形成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塗爾幹提出了幾個重要的社會學思想——如社會整合（塗爾幹用的術語是社會團結）以及整體大於部分之和都來自這兩位教師的觀點。

從巴黎高師畢業以後，塗爾幹開始在巴黎的公立中學教書。為了能夠得到進修的機會，1885年—1886年，塗爾幹爭取到了一個到德國進修心理學的機會。他在心理學大師馮特的指導下，鑽研試驗心理學，並對人類的行為機制的科學實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在德國，他也結識了德國早期社會學家滕尼斯，並瞭解了他對社會和社區（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的分別，但是後來塗爾幹一直研究的是社會，社區似乎並沒有進入他的理論視野。

從德國回來之後，塗爾幹發表了三篇介紹德國哲學和社會科學的研究性的文章。1887年，法國教育部委任他擔任波爾多大學文學院教育學和社會學教授，這是世界上第一次將社會學引入大學講堂。他的同事有埃斯皮納——一位著名的研究英國社會進化論學者斯賓塞的學者、阿姆蘭和洛蒂埃。埃斯皮納對斯賓塞的研究無疑對塗爾幹的結構論思想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塗爾幹一方面贊成斯賓塞的社會結構和分層的思想，但也不同意斯賓塞把社會進步是由於個人追求最大利益和幸福自由造就的觀點。塗爾幹認為，情況恰恰相反，社會正是人們為了追求各自的利益而達成的妥協，而這必定要以現存的社會為條件。從這時開始，塗爾幹逐漸形成了具有他個人特點的社會學思想。

在一系列的學術思想的撞擊中，塗爾幹開始形成他自己獨特的學術見解。從1888年開始，一系列代表塗爾幹學術思想的著作開始問世：《自殺論》、《勞動分工論》、《社會學的基本方法》、《宗

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圖騰崇拜》等，從而使塗爾幹成為社會學法國學派的中堅人物。為了更好地宣傳自己的學說，1890年，塗爾幹創辦了第一個社會學刊物——《社會學年鑒》。這個刊物一直辦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不久，塗爾幹便去世了。《社會學年鑒》的出版和發行表明，社會學已經開始逐漸成熟起來，並成為一個有著很大社會影響的學科。法國真正成為社會學的故鄉。

由於塗爾幹的傑出貢獻，波爾多大學的社會學講壇成為法國社會學界的權威講座。鑒於塗爾幹在法國社會學界的重要影響，1902年，巴黎大學特地聘請他擔任該校的教育學講座教授，同時聘任他為巴黎大學社會學和教育學的教授。巴黎大學的聘請實際上等於正式承認社會學是一門學問，是和其他學科一樣具有自己的學術特性，因此這個決定對於社會學的發展有著極為重要的學術意義。此後，塗爾幹的學術研究主要轉向宗教社會學和教育社會學，在此期間，推出了他的最後一部論著——《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年）。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他的獨生子在戰爭中陣亡，這使他極度悲傷。此後的兩年，他一直沒有從這個打擊中恢復過來，1917年11月15日，這個社會學大師終於在巴黎去世，享年59歲。

塗爾幹的一生實際上是在為社會學的創立和正名而奮鬥的一生。由於他的努力，社會學這個年青的學科終於登上了歐洲學術寶座，並成為今日極具影響力的一門學科。

和塗爾幹相比，索緒爾則要幸運得多。由於語言學一直是歐洲學術殿堂中的一門重要的學科，因此索緒爾的努力主要是力求在方法論上對語言學進行革新和發展。而正是他的這種革新和發展，才使得語言學以其現代性進入了人文科學中的領先學科的行列。

1857年，索緒爾出生在日內瓦一個法國人家庭。在那裏他一直讀到中學畢業。在1875年，他在日內瓦大學讀了一年之後，又轉到德國萊比錫大學學習語言學。那時候的萊比錫大學正是青年語法學派（Junggramatiker）最盛行的時候。以奧斯托霍夫（H. Osthoff）為首的一幫年輕教師反對他們教師的古爾秀斯（G. Gurtius）的語法觀，並組織了一個小團體研究語言問題。他們主張，語言的發展主要表現為兩種傾向：一種是類

推原則，一種是語言定律無例外，如果有例外，一定有別的因素在起作用，而他們把這種作用歸結為心理聯想的結果。作為奧斯托霍夫的學生，索緒爾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這個學派的影響。例如，在索緒爾最著名的那本《普通語言學教程》一書中，索緒爾就把語言線性規律的一個重要原則——組合關係和聚合關係就命名為“句段關係和聯想關係（rapports syntagmatique et associatifs）”。由此可見，索緒爾的思想是受到了青年語法學派的重大影響。就算是他的結構主義思想和青年語法學派沒有繼承關係，但影響肯定是存在的。

在奧斯托霍夫和雷斯琴的指導下，索緒爾鑽研歷史比較語言學，並於 1878 年寫出了他的第一篇研究論文——《論印歐語母音的原始系統》，文章對歷史比較法的熟練運用以及對原始印歐語的構擬使他的導師們大為驚訝。接著他又轉到了柏林大學學習，1880 年又回到萊比錫大學考博士學位，1881 年，到法國巴黎高等研究學院教授梵語，並兼任巴黎語言學會秘書。在巴黎的十年，他主要忙於教學，很少寫文章。但是當時法國學術界頗有影響的塗爾幹和塔爾德（法國另一位著名的社會學家）的學說卻對索緒爾的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以致後來的語言學史上竟把索緒爾的名字列在語言學的社會心理學派之中，成為語言學社會心理學派的重要代表（見岑麒祥：《語言學史概要》，第 266 頁）。1891 年，索緒爾離開法國，回到故鄉日內瓦，並在日內瓦大學教授梵語和印歐語比較語法。1906 年開始教授普通語言學。1913 年病逝於日內瓦。1916 年，索緒爾的學生將他的三度講稿彙集起來，編輯成一本《普通語言學教程》，成為索緒爾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學術著作，是他的學說的主要代表作。在這部著作中所闡發的思想構成了今日語言學的最主要的理論基礎，並對其他的社會科學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兩位學術大師都有在德國學習心理學的經歷，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在他們其後的學術研究中，心理學肯定在其中起了些重要的影響。然而對待心理學和他們所研究的物件之間的關係，兩位大師的態度是很不相同的。由於語言學的學術地位早已確定，而且語言學和心理學的關係是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心理現象和語言總是糾葛在一起，因此，索緒爾對待心理學是一種坦然面對、勇於承認的態度，他並

不避諱語言學和心理學的複雜關係，並且還將心理學引入他的學術討論中來，這就是日後為什麼許多語言學史家將他稱之為“社會心理學派”的代表。而塗爾幹則不同。由於在塗爾幹時代，社會學才是一個剛剛誕生的嬰兒，需要社會承認他的存在，而這一切成為塗爾幹一生工作的主要目標。所以塗爾幹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為社會學正名，說明社會學既不是哲學的附庸，也不是心理學的附庸，而是一個獨立的、有著自己確定的研究物件和研究方法的學科。正因為如此，塗爾幹再三聲明，社會學和心理學不是一回事，社會學不研究諸如像思維、想像、意識等心理學的研究物件，社會學只研究社會現象，只研究基於人的社會行為所構成的社會事實。在他的《社會學方法論》一書中，他堅決的聲明這一點，使得瞭解今日社會學的人們都不免吃驚。然而人們也發現，儘管塗爾幹一再否定心理學對社會學的影響，但在他的論著中也時不時地透露出心理學對社會學的影響來。例如關於集體意識對社會組織的形成以及對社會整合的作用還時不時地閃現在塗爾幹的著作中，而意識顯然是心理學研究的物件，因此可以說，儘管塗爾幹為了社會學的生存，一再否定心理學對社會學的影響，但是，他的心理學的習得的經歷還是使他不知不覺的採用了心理學的研究的思維方式和方法。所以，研究心理學對社會學、語言學，更主要的是對結構主義的影響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題目，值得作進一步的研究。

我們還要指出的是，結構主義這個名字並不是索緒爾提出來的，是後人加在索緒爾的頭上的。而語言學界對索緒爾的分析（也包括許多哲學界、人文社會科學界的索緒爾的研究者）也都強調索緒爾對語言平面的認識和解析。然而他們卻忽視了這一點，儘管索緒爾在他的《普通語言學教程》中強調的是對語言平面結構的解析，但是索緒爾並沒有忽視社會環境對語言的約束和影響。在這本書中，索緒爾用“外部語言學”這個名稱來稱呼社會環境對語言的影響，而用“內部語言學”的名稱來稱呼語言結構的研究，這說明索緒爾還是重視社會環境對語言的制約力的。然而只是由於當時索緒爾要反對的是歷史比較語言學對語言研究的統治，反對只重視死語言、只重視對語言的來源的解析，而不重視活語言的研究的這一種狀況（歷史比較語言學並非不研究活著

的口語，而是主要把這些口語作為材料去論證原始語，對活語言的結構並沒有太多的注意），為此他大力疾呼要重視對語言平面的研究，提倡語言的結構分析，並由此提出一整套嚴密而科學的研究方法。這才是索緒爾結構主義思想形成的最基本的原因。我們並不否認社會語言學對今日語言學的推動作用，然而一味誇大社會語言學的作用，進而否認語言結構分析仍然是當前語言學研究的主要內容，這是不切合實際的。世界上的語言多得很，現在被認真分析了語言沒有幾種，結構主義仍然應該是語言研究中的最主要的方法。

2. 塗爾幹結構論概要

作為現代社會學的創始人，塗爾幹在社會學界一直享有崇高的聲譽。雖然從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由於帕森斯的巨型理論的出臺，以及其後的一系列理論變革，作為社會學創始人的塗爾幹的理論也顯得有些陳舊而失去了往日的光輝，特別是批判社會學的產生和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興起，以及對馬克思的社會學思想的遺產的興趣重新高漲，使得作為馬克思學說的對立面的塗爾幹學派逐漸走上下坡路。但是無論怎樣，只要是談及社會學，就不可能完全繞開塗爾幹。因為，塗爾幹確立了社會學的基本研究方法以及一系列的理論原則，這些都是社會學研究的基本所在。

在社會學史上，塗爾幹屬於古典作家的行列，和馬克思、孔德、韋伯齊名。這種古典作家的分類表明，塗爾幹和其他古典作家一樣，都不能被劃歸到某某學派的圈子裏去，他們是為社會學這一個學科奠定基礎的大師，他們的學術研究都為社會學的創立打下了基礎。後人正是在他們的基礎上繼續進行研究和創新，才形成了一個個的學派。儘管如此，在這幾個古典大師的著作中還是可以看得出他們的學術傾向來，也正是這種學術傾向才為後來的研究者提供了可以發展的空間，進而形成不同的流派。

社會學的流派很多，但最基本的劃分可以分為兩類，一類可以稱之為衝突論，一類可以稱之為結構功能主義。其他的許多流派都可以從這兩個學派中發展出來。衝突論的公認的鼻祖是馬克思，但是其他古典大師也對衝突論有著自己的獨

特的看法；而結構功能主義的鼻祖則要歸屬於塗爾幹。M. 波洛瑪明確的指出：“杜爾克姆的經典著作對於作為社會學中的一個特別觀點的結構功能主義的產生作出了最大的貢獻。”¹ 她還進一步指出，塗爾幹的功能主義思想對於作為人類學家的馬林諾夫斯基和拉德克裏夫·布朗有著巨大的影響，並在人類學中產生了結構功能主義學派。

結構功能主義和衝突論是對立的。如果說，衝突論強調的是矛盾和鬥爭，那麼，結構功能主義強調的則是和諧和穩定。波洛瑪認為，“杜爾克姆把現代社會看作一個真實存在的有機整體。這個有機整體有一些必須由他的各個部分來滿足的需要或功能。假如某些需要得不到滿足，就會出現一種病態的現象。比如，現代社會中，經濟功能就是一種必須被滿足的需要。假如在經濟方面有嚴重的波動，就會影響到社會系統的各個部分並最終導致對整個社會系統的影響……系統中的這樣一種震動，可以看作是一種病態，而這種病態最終將自行消除以便恢復到原來的正常狀態。”這就是現代社會學所說的“平衡系統”和“社會變遷”的主要理論發源地。²

從這種思想出發，我們可以看出塗爾幹學說的主要特點，筆者認為，塗爾幹的結構功能主義，功能是主要的，結構是附屬於功能的，為功能服務的，但是，就是這樣一種特點，也可以體現出塗爾幹結構論的一些主要特點來。塗爾幹的結構論大體上說來可以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整體觀。整體觀是塗爾幹學說中的一個相當重要的方面。塗爾幹在這方面為社會學的發展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基礎。整體論實際上是一種觀察問題的方法，簡單地說，所謂整體論就是在分析事物物件的時候，不能僅僅從一個角度或一種因素對事物進行分析，應該考慮到影響事物發展的各個因素。一般說來，社會學以外的其他學科，對事物的分析往往受制於學科的範圍，而很少考慮到學科以外的社會因素——結構語言學就是一個比較明顯的例證。雖然結構語言學強調語言各要素之間的相互聯繫和相互影響，但是結構語言學卻只在語言結構中探討和研究，一般並不越出語言結構之外進行探討和研究。這就是索緒爾所

¹M. 波洛瑪. 当代社会学理论[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第 21 页。

²M. 波洛瑪. 当代社会学理论[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第 21 页。

劃定的內部語言學的範圍。社會學則不相同，社會學對社會現象的分析是全方位的，它在對一種社會現象分析時要考慮到與這種社會現象相關的其他多種社會因素之間的相互影響，從而對這種社會現象的形成和發展提出社會學的看法。這就是社會學的多變數分析。這一點是社會學和非社會學學科的最主要的不同點，所謂各種社會學的分科，實際上也都是在這方面與其相關的學科有所不同。像社會語言學就是一種社會學的分支學科，它和結構語言學的不同就在於它關注的是社會環境與語言之間的相互影響。它研究的範圍不僅包括口語和方言，而且還包括年齡、性別、種族、環境所造成的語言變體（語言學的術語叫做言語變異）。這就是社會學方法論的一個主要的特點，也是社會學的整體論的重要體現。但是除了這種多變數分析之外，塗爾幹還為社會學的整體論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原則，那就是“整體大於部分之和”。這也就是說，整體並不是部分的簡單相加，一旦部分匯合為整體，其性質就有所改變。塗爾幹這樣說：“無論什麼時候，什麼因素，當幾個因素結合在一起的時候，通過這種結合的事實，都會產生新的現象。這種新現象不是存在於各個參與結合的因素中，而是存在於由它結合的整體中。”³塗爾幹舉例說，生命的細胞是由一些元素或礦物質組成的，然而這些組成生命細胞的元素（如氫氧碳氮等）都不存在著生命，生命則是由這些元素的結合產生的。“生命是一個整體，不能解析。因此只有在整體中才有生命的物質，生命的物質存在於整體中，而不在整體的各個部分中。”⁴將這種思想引入社會學，就成為塗爾幹功能主義思想的最初的起源：“構成社會的這種特殊的綜合產生了與個人意識現象不同的新現象，這種新現象存在於社會，而不存在於社會的各個部分，即不存在於構成社會的各個成員中。從這個意義上講，社會現象外在於個人意識。”⁵因此，社會現象是一個客觀實在，對社會現象的研究必須排除心理研究的干擾，才能科學地進行研究。在塗爾幹之後，這種功能主義思

想在社會學、人類學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形成了社會學的主流學派——結構功能主義。這種結構功能主義強調的是科學研究的物件是客觀實在，強調社會不依賴人們的主觀意識而存在，它不僅是一種觀念上的存在，而且也構成了一個能動體系。這就是塗爾幹強調“社會現象必須用社會事實來解釋”的根本原因。因此，塗爾幹的整體論學說是一種能動的、相互聯繫的、互為作用的系統理論。這種理論不僅強調客體事物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而且每種客體都在社會中佔有一定的位置，發揮著一定的作用。塗爾幹在他的方法論的序言中以犯罪這一現象作了說明：“因為如果說在社會上存在著犯罪是一種正常的現象的話，那麼，對犯罪的懲罰同樣也是正常現象。犯罪的存在是一種普遍現象…要想犯罪不存在，除非把每個人的個人意識拉得整整齊齊，然而這是不可能的…人們從簡單化的意義去看待犯罪、去排斥這一討厭的事實，不瞭解犯罪在另一方面卻是對社會有用的事物…痛苦是一種正常現象，人們不喜歡它；犯罪是一種正常現象，人們憎恨它，這都並不矛盾…因為它把社會現象當作事物，他的性質無論如何靈活、可塑，都不可能用人們的願望來改變它。”⁶因此客觀精神實際是塗爾幹社會學的一個突出的特點，而對這種客觀事實進行解析的方法就是結構分析法。從此結構分析脫穎而出，成為人文社會科學中一種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社會結構的分析。社會結構的研究是塗爾幹社會學研究的重點，除了那本《社會學研究方法論》之外，塗爾幹的其他著作大都可以屬於社會結構分析的範圍內，尤其是《自殺論》一書更凸現了塗爾幹社會結構分析法則的主要原則，這就是用社會事實解釋社會現象的方法。應該說，這種方法是從整體論中發展出來的一種社會學的解釋方法。如果說，整體論強調的是部分與整體的關係，那麼，用社會事實解釋社會現象的這種方法則是將整體論的方法倒置過來，強調的是從整體中析出部分。這正是結構分析的精髓所在。既然社會現象是由不同的社會因素構成，又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因此在分析社會現象的時候，除了應該確定該現象的社會性質以及在社會上所佔有的

³迪尔凯姆. 社会学研究方法[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8.

⁴迪尔凯姆. 社会学研究方法[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8, 第7页。

⁵迪尔凯姆. 社会学研究方法[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8, 第6页。

⁶迪尔凯姆. 社会学研究方法[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8, 第2页。

位置以及所能發揮的功能之外，對構成這種社會現象的諸因素進行分析也是題中應有之義。

簡單地說，用社會事實解釋社會現象這種方法就是對構成社會現象的諸因素一一進行解剖，把構成社會現象的各種因素及其相關的影響揭示出來。由於社會現象的形成和發展是由多種社會因素相互聯繫、相互影響造成的，因此對這些相關的社會因素進行分析也就成為社會結構分析的主要方法。塗爾幹的這種研究方法之所以強調用社會事實來解釋社會現象，就是因為塗爾幹反對用心理的、觀念的因素對社會現象進行解釋。比如像自殺這樣一個社會現象，也許許多人認為其主要原因是心理因素所使然，然而塗爾幹堅決地反對這一點，他在《自殺論》一書中，對自殺的社會成因進行了詳細的研究，指出雖然自殺看起來像是個人心理因素活動的結果，但是實際上自殺是受到多種社會因素的影響造就的，比如說，性別、年齡、職業、宗教等方面都可能成為自殺的社會因素。塗爾幹通過統計分析得出了這樣的一個規律：自殺者，男人比女人多，老年人比年輕人多，軍人比百姓多，新教徒比天主教徒多，獨身者、鰥寡者或離婚者比結婚者多；自殺的百分比，夏天比冬天高、城市比鄉村高。他分別對這些因素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從社會根源將自殺分為三種類型：利己型、利他型和動亂型。利己型是由於個人與社會脫節而造成的孤獨無助形成的自殺，利他型是為著某種政治信仰或宗教信念而捐軀，動亂型是在動盪年代因為生不逢時，或由於不適應劇烈的社會變遷而輕生。因此，塗爾幹認為，自殺並不取決於個人的本性，而是取決於支配著個人行為的外部環境。這樣，塗爾幹就反駁了把自殺歸結為心理因素（精神失常、遺傳因素、種族特徵）以及天象（氣候、季節、晝夜）等原因，深刻的說明，就像自殺這樣一個有很強個性特徵的行為也是受到社會環境的制約的，與社會諸因素相聯繫的。因此就是那些被認為完全是個人性的、看上去與別人無關的現象也可以通過對社會結構及其擴散功能的分析得到解釋。因此，塗爾幹《自殺論》一書就成為社會結構研究的經典之作，它所確立的研究方法和理論原則，成為其後研究社會結構的樣本。

理性主義和客體論。理性主義是塗爾幹社會學理論的最基本的原則，這種原則後來也被大多數社會學流派所繼承。由於受到自然科學的啟

發，社會學的創始人——孔德、斯賓塞們就開始採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分析社會，力圖將社會學納入自然科學的軌道。孔德在研究社會學的時候，曾將社會學納入物理學的範圍內，稱其為“社會物理學”。將社會結構的研究稱為“社會靜力學”，將社會變遷的研究稱之為“社會動力學”；斯賓塞則將社會學依附於生物學，稱社會就像生物一樣有發育、成長和衰亡的階段。塗爾幹不同意他的前輩們的這種觀念，但他贊同這些社會學的前輩們用科學的和理性的方法來分析社會現象。塗爾幹主張，社會學是一個獨立的學科，不依附於或從屬於任何學科。它不是自然科學的附庸，更不是哲學、歷史學的附庸。因此他強調社會現象是一種客體，要研究社會，必須把社會現象當作客體來研究。因此他反對當時研究社會學的人從主觀的、意念的和思想的角度出發去解析社會現象，而主張必須將社會作為一個客體來解剖、來研究。這樣他便為社會學的研究創立了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個既承襲並發展了社會學前輩們的理性主義的科學原則，又獨創了分析社會現象的獨特的研究方法，完成了對社會學的理論體系和方法論的建構——他之後的社會學家一直沿用他的這個基本原則和方法來分析和解釋社會現象——雖然在當代社會學中，這種理性主義有所削弱，人文主義思想有所抬頭，但從主流上看，理性主義和科學實在論仍是社會學研究所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則。

塗爾幹理性主義社會學的一個最主要的觀念就是強調社會存在的客觀性。社會是一個客體，社會現象是一種客觀事物，研究社會必須把握這樣的基本原則。作為客體的社會，有其獨特的規律，社會學就要發現和分析這樣的規律，這也就是社會學的基本任務。為了研究社會，社會學家們必須像自然科學家那樣去觀察社會，因此，社會學的研究必須去接觸事實。要研究問題，就必須去瞭解問題，不能像過去的哲學家們那樣，既不去親自瞭解事實真相，又不親自下去作調查，在搖椅上構思社會。社會學家之所以特點別重視社會調查，原因就在這裏。

為了實踐社會存在的客觀性，首先就必須反對意識形態和觀念主義。塗爾幹認為，“觀念是人與事物間的一層隔膜，有時用了它，事物的真實狀況反而愈加朦朧。人們卻以為看得一清二楚。”因此，“科學必須以它的材料作依據才能

成立。如果用觀念去估量事物，就缺少這種根本，科學就無法成立。即使勉強拼湊成一種殘缺不全的科學，由於沒有根基，就會變為一種藝術。”⁷對於這種損害科學的藝術，塗爾幹深惡痛絕，他堅持認為，“這種以藝術來侵佔科學研究的思想，對於那些把科學看為急用品的人，有時可能是很便利，但是卻阻礙了科學的進步。”⁸塗爾幹認為，對於社會學的研究來說，這種觀念主義的威脅特別嚴重，因為，“社會事物是通過人才能實現的，是人類活動的產物，它們必然要反映在人的意念中……並且據此來處理人與人關係中的各種各樣的事物。”⁹因此，他主張，“考察社會現象，必須考察實際，不能摻進個人的想像，否則就無法瞭解它的真相。”¹⁰正因為如此，“社會學方法要求人們不能用常識代替科學，凡是未經科學檢驗的概念，不能隨便使用，更不能用來代替事物本身。”¹¹

儘管如此，但對於社會學這樣一個以人們的日常生活和社會現象為研究對象的學科來說，簡單地從理論上反對主觀臆斷和觀念主義容易，但是實際操作起來卻難上加難。因為這些社會現象、這些社會生活都是與個人的生存息息相關的，很難實踐塗爾幹說的“必須將社會現象看作是社會本身的現象，是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外部事物，必須……把它們當做與己無關的外部事物來研究。”¹²為此，塗爾幹建議道：“法律存在於法典中，日常生活發生的許多事情表現在統計數位中或記錄在歷史材料中。‘時髦’可以從人們的穿戴中反映出來，‘嗜好’可以見諸文物藝術，等等”。因此，塗爾幹總結道，“社會現象的各種表現是在個人意識以外，只須考察外部事物而不必考究個人內部的事務。”¹³

⁷迪尔凯姆. 社会学研究方法[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第 14 页。

⁸迪尔凯姆. 社会学研究方法[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第 15 页。

⁹迪尔凯姆. 社会学研究方法[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第 16 页。

¹⁰迪尔凯姆. 社会学研究方法[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第 16 页。

¹¹迪尔凯姆. 社会学研究方法[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第 19 页。

¹²迪尔凯姆. 社会学研究方法[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第 23 页。

¹³迪尔凯姆. 社会学研究方法[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第 25 页。

這樣，塗爾幹就把我們引到了他的社會考察三原則的方法上來。

(1) 排除觀念（成見）法。

我們前面已經說過，塗爾幹極力反對觀念對科學的入侵，認為要保持科學的客觀性就必須排除觀念和成見。因此在他的社會觀察三原則中的第一條便是排除成見法。為此，塗爾幹特別欣賞笛卡兒的懷疑論，認為，笛卡兒的懷疑論是一種考察事物的科學方法：先得將以其前所有的觀念都置於懷疑的地位，然後再用科學的方法驗證，驗證後證明是科學的方法才能使用。當然這種懷疑也適用於對日常生活和相沿成習的習慣的考察，這點對於社會學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塗爾幹又不得不承認，在社會學中排除這種成見是特別困難的。原因在於社會現象與人的情感聯繫非常密切。信仰某種宗教和政治意識的人，要他將自己的信仰和意識置於被懷疑的地位幾乎是不可能的，甚至有可能被認為是大逆不道。儘管如此，塗爾幹還是大聲疾呼，必須反對這種情感制約科學的情況。“情感不能享有隨意否定實際事務的特權，感情不是一種神秘的東西，它同樣也是通過歷史的沿襲，從一些鬆散的、混合的人類經驗中得來的……感情可以做為科學的物件，但不能作為科學真理的標準。”¹⁴社會學要成為一門科學，就必須清除這些先入為主的俗見才能發展起來。

(2) 科學考察法。

塗爾幹用了一個繁瑣的名稱來稱呼這種科學考察法，叫做：“根據社會現象的外部共同特徵進行定義”。實際上用通俗的話來說，塗爾幹的這種考察法就叫做科學考察前的準備工作。我們都知道，社會現象複雜而多樣，要研究社會現象首先就要確定研究物件。而這種確定研究物件就是塗爾幹所說的定義所研究的事物，即確定到底研究那些事物和社會現象。塗爾幹主張，要研究社會現象，就必須把所有性質相同的社會現象收集在一起來進行研究，而不能僅僅挑幾種現象作為代表來定義。這樣的話就會犯了塗爾幹最忌諱的以主觀觀念定義科學的原則，所以在定義了這個原則之後，塗爾幹用了相當多的篇幅解釋為何要將所有性質相同的社會現象集中在一起進行研

¹⁴迪尔凯姆. 社会学研究方法[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第 27-28 页。

究的必要性。

塗爾幹首先指出，由於我們的研究一開始對該種社會現象的內涵瞭解得還不清楚，還不知裏面的水有多深，所以塗爾幹給開出的藥方就是從外形（實際就是表像）入手，將一切性質相同的社會現象都集中在這個外形之下，然後再著手研究。比如研究犯罪現象，就要把所有的犯罪現象和懲罰行為收攏到“犯罪學”的名義之下；比如研究家庭，即要把所有的因為血統關係或因法律關係結合在一起的社會組織——不管是氏族制、母系制還是父系制的社會組織都結合在一起，只要是兩性結合構成的組織都可以放在家庭生活的名目下。這種包括應該是全方位的，不僅應該包括普遍現象，也應該包括特殊現象——如同性戀家庭也應該包括在家庭生活中去考察。在這裏，塗爾幹又再次反對根據觀念去鑒別社會現象的做法，他強調必須包括一切性質相同的社會現象，而不能用自己的觀念去曲解這種現象。他批評了斯賓塞對婚姻的理解是錯誤的，沒有找出強制式的一夫一妻制和自由式的一夫一妻制的區別；也批評了加若菲洛的《犯罪學》，說他不應該把過去認為是犯罪行為，今天不認為是犯罪行為的犯罪現象，認為不是真正的犯罪。塗爾幹就此寫道：

“原始社會公認的犯罪行為，在現代社會中可能不再是犯罪行為，但是人們仍然認為這種行為在當時就是犯罪，與現代社會的犯罪行為具有同樣的性質。原始社會的犯罪現象由於社會生活的變化而發生改變，現代社會中的犯罪則由於社會情況未變而沒有發生改變，兩者不存在哪一種是真犯罪，哪一種是假犯罪的問題。即使認為那些不再存在於目前社會的犯罪行為不具有犯罪學上的特徵，也不能將這些行為排除在犯罪這一名詞以外。因為在犯罪行為中，規則現象和不規則現象雖然形式不同，犯罪的性質卻沒有什麼不同……犯罪這一事物，雖然有規則和不規則的區別，但是兩者對於犯罪事實這一點總是相同的，不同在於因時因地發生和變更的程度、形式不同。不規則犯罪行為仍是一種犯罪，應該把它包括在犯罪一詞的定義中。”¹⁵讀完這句話，我們便可以瞭解塗爾幹的所謂定義社會現象的外部共同特徵的最主要的想法了。現象是現象，變遷是變遷，不能

因為事物時過境遷，社會環境發生了變化，事物的性質就會發生變化。塗爾幹為了打消人們對他的這種幾近苛刻的科學實在論的懷疑，再三解釋說，他的這種苛刻的定義是為著便於著手研究社會現象，而不是在研究中或研究後用外形（表像）觀察法的結果來揭示事物的實質。

有了這一番定義和科學檢驗後，便可以開始第三個步驟：考察事物的外部特徵。這個方法用塗爾幹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社會學者研究社會現象必須想辦法從那些排除了個人特殊現象和已經確定的事物入手。”怎樣排除個人特徵呢？塗爾幹提議要首先考察一些固定不變的現象，暫不考慮研究與個人特殊現象密不可分的或變化無常的生活方式，才能把科學的根基紮在堅實的土地上，而不是流沙上。而塗爾幹認為，固定現象可以是法律條文、道德、諺表現為一種獨立於個人行為的特徵。社會學研究者應該以這種固定現象作標準，從研究固定現象著手，進而觀察那些不固定的現象。

總起來說，在社會學初創時期，塗爾幹以自然科學為藍本，力圖將社會學建構成為一個有著嚴密的理論體系、謹嚴而科學的研究方法和很強的邏輯性的學科體系，為此他付出極大的努力，終於使得社會學成為一個在人文社會科學中有著較高科學聲譽的學科。雖然在其後的發展中，由於學科領域的擴大，以及學術思想的改變，使得社會學的嚴謹性有所弱化，但是塗爾幹所創立的社會學的基本原則和基本的研究方法還為今日的社會學研究者所遵從。但就塗爾幹的結構思想來看，雖然已經顯露端倪，但是還沒有構成一個完整而嚴密的體系，構建結構主義的工作，要等到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綱要》的問世來完成了。

3. 索緒爾的理論體系

和塗爾幹不同，在最近幾十年間，索緒爾的名字已經大大地擴展到語言學領域之外。除了同為法語作家的列維·斯特勞斯根據結構主義布拉格學派的音位理論創造出結構主義人類學之外，在文學、哲學等人文學科中，也都有了結構主義學派。結構主義成為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的理性主義學派的代表。而這些結構主義學派的指向都可以歸結到索緒爾的名下。

¹⁵迪尔凯姆. 社会学研究方法[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8, 第 33 页。

索緒爾的結構主義思想形成於他在日內瓦大學的授課期間，最早他是講授歷史比較語言學，從 1906 年起，他分三次開始講授普通語言學課程，索緒爾的結構主義思想就是在這三度授課中形成的。

歷史地來看，索緒爾的結構主義是對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方向的反撥，而索緒爾作為新語法學派的重要成員，結構主義又和新語法學派的理論有著密切的聯繫。要想瞭解索緒爾的結構主義思想，就必須瞭解歷史比較語言學和新語法學派的理論基礎。

歷史比較語言學是在語文學的基礎上產生的。語文學是古代歐洲研究文獻語言的一門學問，主要以考訂和評注古代文獻為內容，它同時兼顧語言和歷史的研究，而它對語言的研究主要是對古代文獻的研究，對活著的口語不予理睬。中國的傳統語言學——小學、考據學、目錄版本學、校勘學、金石學等等也是屬於語文學的領域。梵語的發現促進了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誕生，歐洲人終於發現，在萬里之外的亞洲，還有一支和他們十分相似的語言，親屬語言的概念就這樣產生了，印歐語諸語言的比較研究構成了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的核心，梵語則被認為是最古老的印歐語，各種印歐語都是從梵語中分化出來的。由此，歷史比較語言學將其研究視角轉向了對**活著的語言**的研究，語文學研究逐漸降溫。但是，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活語言並不是要研究它本身的結構，而是試圖對各種語言的比較來達到構建古代語言的目的。1814 年，丹麥皇家科學院曾就古斯堪的納維亞語的淵源發佈徵文廣告，這個廣告很可以反映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研究方向和內容：

“用歷史的批判方法，以確切的例證，探討並說明怎樣才能最有把握地推求古斯堪的納維亞語的淵源。敘述這個語言的特點，並從古代起，通過中古，闡述它跟斯堪的納維亞語和日爾曼語諸方言的關係；正確規定一些基本原則，而這些語言的派生和比較應該是建立在這些原則上面。”¹⁶

應該說，這是一份歷史比較語言學原則的宣言書，它的問世表明歷史比較語言學已經正式走出文獻語言研究的藩籬，開始了歷史比較語言學

的年代。早期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著作，如拉斯克（Rasmus Rask, 1787-1832）的《古代北方語言或冰島語的起源研究》、葆樸（Franz Bopp, 1781-1867）的《比較語法》和格裏木（Jacob Grimm, 1785-1863）的《德語語法》則為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發展開闢了道路。

索緒爾也是從歷史比較語言學入手進入語言學的殿堂的。1876 年，索緒爾從日內瓦大學轉學到德國萊比錫大學學習語言學，他的老師是新語法學派的奧斯托霍夫（H. Osthoff）和雷斯琴（A. Leskien），他們都是新語法學派的中堅人物，因此，索緒爾在他學習語言學的初期，就已經接受了新語法學派的觀點了。

新語法學派是在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從本質上說，新語法學派仍是歷史比較語言學中的一個流派。新語法學派誕生於萊比錫大學，其中堅人物是：勃魯格曼（K. Brugmann）、德爾布呂克、保羅（H. Paul）、奧斯托霍夫、雷斯琴。他們都是歷史比較語言學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古爾秀斯（Georg Curtius）的學生。古爾秀斯在歷史比較語言學上的最大貢獻在於將古印歐語分成兩支：一支是以梵語和波斯語為代表的亞洲印歐語，其特點是基本母音有 a i u 三個；而歐洲古印歐語則有四個基本母音：a i u e。因此，古爾秀斯打破了梵語是印歐語的母親的神話，這個觀點對於正確理解梵語在印歐語的地位有著重要的影響。

關於新語法學派的產生還有一個有趣的故事。古爾秀斯在萊比錫大學授課期間，還主編一本名叫《希臘拉丁語語法研究》（Studien zur griechischen und lateinischen Grammatik）從第九卷開始，他讓他的學生勃魯格曼與他合編，在第九卷將要發排的時候，古爾秀斯有事出差了，便將編輯的責任委託給勃魯格曼，勃魯格曼將他的一篇論文《印度日爾曼基礎語的鼻音領音》（Nasalis sonans in der indogermanischen Grundsprache）收了進去。等古爾秀斯回來，看見這篇文章很不高興，但已經排版，無法更改，於是便在卷末聲明，這篇文章未經他審查，但因當時他出差了，因此文責自負。勃魯格曼看了也很不高興，於是不再肯給他老師的刊物寫文章，他和他的朋友奧斯托霍夫等人也合辦了一個刊物，名叫《形態學研究》（Morphologische Untersuchungen），和他老師的觀點對著幹。這個

¹⁶裴特生. 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第 244 页。

刊物後來成為新語法學派的核心刊物。新語法學派的最重要的觀點是語音定律無例外和類推作用。實際上他們的研究成果最終證實他們的老師古爾秀斯的觀點——梵語不是最古老的印歐語——是成立的。

在勃魯格曼和古爾秀斯就歷史比較法激烈爭論的時候，1876年，索緒爾來到萊比錫大學學習語言學，他的指導老師是古爾秀斯，古爾秀斯的學生雷斯琴、奧斯托霍夫分別指導他學習歷史比較語言學。索緒爾很贊同新語法學派的觀點，經常和他們一起討論問題，實際上已經成為新語法學派的一員。1878年，索緒爾轉學到柏林大學，發表了他的第一篇重要的語言學文獻：《論印歐語母音的原始系統》（*Mémoire sur le système primitif des voyelles dans les langues indo-européennes*）該文使用了後來被稱為結構主義的理論方法，巧妙地將他老師們的觀點（古爾秀斯和新語法派）溶鑄於一爐，概括成一個完整的理論，並完美地解釋了印歐語研究中的一些難題，得到學界的極大的讚譽。此後他又回到萊比錫大學考博士學位，1881年在巴黎高等研究院任教，並兼任巴黎語言學會秘書，1891年回國，在日內瓦大學教書，1913年去世。

索緒爾一直都在學校裏教書，沒有留下什麼著作。他最著名、也是最能代表他的學術觀點的《普通語言學教程》也不是他親筆寫就的，而是他的學生根據聽課筆記記錄編輯而成的。雖然後來也陸續整理和發表了一些索緒爾的講課提綱，但是影響都不如那本《教程》大。因此我們就依據《教程》並參考索緒爾第三度授課的記錄本（上海人民出版社有屠有祥的譯本，書名叫《索緒爾第三次普通語言學教程》，2002年版，但是本書的翻譯不是很好，許多已有定譯的語言學術語和語言學家的名字和都重新定義，文字也很生澀，閱讀起來很困難。因此本文依然採用《教程》的通行譯本所定義的人名和術語），來看索緒爾的結構主義。

首先，我們需要瞭解索緒爾對歷史比較語言學和新語法學派觀點的評論，因為正是這種批評才使他建立了結構主義。

索緒爾熟悉歷史比較法的優點，也深知其缺陷。對於歷史比較法的基本評價，索緒爾是這樣表示的：

“這個學派雖然曾有過開闢一塊豐饒的新田

地的無可爭辯的功績，但還沒有做到建成一門真正的語言科學。它從來沒有費工夫去探索它的研究物件的性質。可是沒有這一手，任何科學都是無法制定出自己的方法的。”¹⁷

索緒爾對歷史比較法的評價是公允的。他承認歷史比較法在語言學史上的地位，又批評歷史比較法是只為比較而比較，完全不過問所做的比較究竟意味著什麼，它所發現的關係有什麼意義，它不清楚比較物件的性質，也不理會這種比較有什麼意義。但是我們要清楚，索緒爾這裏批評的歷史比較語言學不是包括新語法學派以後的歷史比較語言學，而是指的是新語法學派以前的歷史比較語言學。這個階段的歷史比較語言學和塗爾幹之前的社會學大師們（斯賓塞等）一樣，都醉心於仿照自然科學的方法來建構社會科學。語言學的自然主義學派繆勒曾將語言看成是像生物一樣有著生長、發育和衰亡的階段，並創造出“語言生命”的學說。認為語言的發展是有機的，越原始的語言越有增長，音素就越多；越是近古的語言就越衰退。因此他們把這種觀念稱之為史前增長期和有史以來的衰退期，並認為語言的歷史就是這樣構成的。顯然這種解釋語言現象是很隨意的，沒有一個客觀標準。所以索緒爾批評道：“比較語言學家越是像自然科學家考慮兩種植物的成長那樣去考慮語言的發展，就越得不出結論。”¹⁸因此，索緒爾認為歷史比較語言學家得出來的東西和現實的真實狀況不符，完全不能解釋實際話語中的真實情況。而新語法學派則反對這樣看待語言，把語言的研究拉回了科學的軌道上，為此，索緒爾稱讚道：

“語言間的對應只是語言現象的一個方面，比較只是一種手段，一種重建事實的方法。”¹⁹新語法學派“的功績是把比較所獲得的一切成果置於歷史的展望之下，從而使各種事實聯成自然的順序，”因此語言的發展是“語言集團集體精神的產物。”²⁰

這充分證明了索緒爾的新語法學派的立場。

¹⁷索緒爾. 普通語言學教程[M]. 上海: 商務印書館, 1982, 第21-22頁。

¹⁸索緒爾. 普通語言學教程[M]. 上海: 商務印書館, 1982, 第22頁。

¹⁹索緒爾. 普通語言學教程[M]. 上海: 商務印書館, 1982, 第23頁。

²⁰索緒爾. 普通語言學教程[M]. 上海: 商務印書館, 1982, 第25頁。

然而索緒爾也意識到，新語法學派還有許多問題沒有解決，而他所承擔的就是新語法學派的未竟事業。

首先，索緒爾確定語言學的研究任務是：

對一切語言進行描寫並整理其歷史，盡可能地重建母語；尋找語言的普遍規律；確定研究的界限和定義。

索緒爾的《教程》就是從事著後兩個任務的建設工作的。根據以上的安排，索緒爾開始了他的結構語言學的建構，他提出的幾個著名的原則是：

(1) 語言是一種符號系統。

(2) 語言的結構是對立的統一，其主要類型是：共時與歷時/類聚與組合/語言與言語/能指與所指。

(3) 切分語言結構的方法是二項對立。

這些都是瞭解結構主義的人所熟知的，本文不再討論。下面我們討論索緒爾理論中一個關鍵的部分——文字和口語的論述，之所以說這個問題是索緒爾理論的關鍵是因為索緒爾的理論是建立在西方表音文字的基礎之上，而這方面又引起了法國解構主義者德里達的不滿和攻擊。德里達說，索緒爾的文字理論是承襲了他所反對的邏各斯中心主義的變種語音中心主義，並由此產生了解構和顛覆理論。

讓我們來看看這個問題的來龍去脈。

關於語言和文字的關係，語言學家和社會上的俗見完全不同。一般人的理解，研究語言必得研究文字，離開文字則無法研究語言。而語言學家則認為，文字和語言的性質截然不同，研究語言不能和研究文字混為一談。

語言和文字有何不同？

既然語言學家的任務是分析和描寫一切語言並尋找語言的普遍規律，而世界上沒有文字的語言遠遠多於有文字的語言，因此，這種無文字的語言所顯示的語言獨特性也遠遠超過有文字的語言。因此無論在語言描寫上還是在尋找語言普遍規律上，無文字語言的價值是不可低估的。所以對於語言學家來說，必須重視無文字語言的研究。“重語輕文”在語言學界是正常現象。但是這並不是說，語言學家就不必去研究文字了。文字也是語言學家必須研究的物件，因為作為一種語言的載體，文字和語言的命運是不可分離的。語言學家沒有理由要將文字拒之於門外。而且歷

史地說，語言學就產生在對文字和對文獻語言研究的基礎之上。而現實狀況是，有文字語言研究的深度遠遠超過對無文字語言的研究，而許多無文字語言在一些有文字的大語言的壓迫下正日漸消亡，因此，拯救這些瀕危的語言如同保護瀕危物種一樣重要，因此，對無文字語言的研究更加急迫。

語言是變化的，文字是保守的。這種變與不變在語言和文字間便產生了矛盾，語言在不斷地變化，新的因素不斷產生，舊的因素逐漸衰亡並消失，而文字卻因其記錄歷史的功能而少有變化，一二百年、五六百年都是一個樣子，這樣文字和語言的發展脫節，使得文字不能很好地記錄語言。有些該發的音文字上沒有，有些已經消失的讀音在文字上依然保留。文字無法正確地反映語音，造成了寫法與發音的齷齪。像英文、法文，以及我國的藏文、蒙古文都是文字和語音相脫節的例證。他們的文字所反映的語言僅停留在歷史的某一階段，反映的是那一個階段的語言面貌。可是歷史發展了，語言改變了，但文字依然沒有變化。雖然後來會有人對這些脫離當前語言的文字做部分修改，使之較為貼近當前的語言（這就是正字法運動），但都不曾改變整個文字系統，文字依舊脫離語言。

這些都是語言學家之所以“重語輕文”的主要原因，既然文字不能如實反映語言面貌，那麼，以研究語言為職志的語言學家自然要捨棄文字而重視語言了。

實際上，上面兩點也是索緒爾反對“字母暴虐”的主要理由。索緒爾是在反對文字凌駕於口語之上的角度對文字和語言的關係進行研究的。他指出：“語言和文字是兩種不同的文字系統，後者唯一存在的理由是在於表現前者。語言學的對象不是書寫的詞和口說的詞的結合，而是由後者單獨構成的。但是書寫的詞常跟它所表現的口說的詞緊密地混在一起，結果篡奪了主要的作用，人們終於把聲音符號的代表看得和這符號本身一樣重要或比它更重要。這好像人們相信，要認識一個人，與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²¹

接著索緒爾又指出了文字的幾大特點，用現

²¹索緒爾. 普通語言學教程[M]. 上海: 商務印書館, 1982, 第47-48頁。

在通行的解構語言說便是：

- (1) 距離（文字的永恆性，語言的暫時性）；
- (2) 缺場（文字的缺場性，語言的在場性）；
- (3) 誤解（文字與語言的差距會使人對語言的作用發生誤解）；
- (4) 含混（文字的表現語言的功能被任意放大，造成文字和語言的含混不清）。

應該說，索緒爾對文字和語言功能的這種劃分是基於對傳統的語言和文字的功能混淆不清的批判。混淆語言和文字的功能在索緒爾以前的語言學家中也有存在。但是，如果不反對這種錯誤的觀點，索緒爾便不能建立起他的結構語言學體系來。因為索緒爾的結構主義是建立在語言的基礎之上的，而文字又是另一個系統，兩套系統混淆不清，把文字現象當作語言現象來看待，就會造成嚴重的錯誤。但是索緒爾的這種觀點也遭到了許多後現代派的攻擊，解構主義的代表人物德里達攻擊索緒爾的這套理論是“語音中心主義”。德里達認為，文字有自己的生成能力和規律，它不是聲音的簡單複寫，不是語言的影子。文字同樣能把握言說的本質。差異是構成文字的基礎。索緒爾指責文字的四大缺陷在語言中也存在，因此語言也不比文字有什麼優越之處。

實際上，索緒爾和德里達依據的文字系統並不相同，因此他們的結論也自然不同。索緒爾雖然承認世界上的文字有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的不同，但索緒爾基本是依據歐洲的表音文字建立起他的理論的。以叛逆著稱的德里達對西方的傳統採取全然否定的態度，他不僅要解構西方的傳統，而且更要顛覆西方的傳統。對於西方文字和語言構築起來的傳統思想，始終是他解構的物件。語言和文字變成他顛覆西方傳統的切入點。他在攻擊索緒爾的語音中心主義是繼承柏拉圖以來西方的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同時，把眼光放到了東方的表意文字上，並發現了東方文字的許多特點，形成了他的觀點：

“如果文字意指書寫，尤其是符號的恒久構造（這是文字概念之唯一無一縮減的核心），那麼，文字從普通意義上說便涵蓋了語言學符號的全部領域……構造這觀念的本身，因此也是符號的任意性。無法想像可居先於文字，或位於文字的視野之外。”²²

於是文字又還原到凌駕於語言之上——甚至包括了整個語言的領域，語言只是文字的符號表現。這正如陸楊批評的那樣，德里達的解構批評特徵，一不是簡單地顛倒二項對立的概念，而是抽換這種二項對立的哲學基礎；二是認為語言是一種不得已的交流工具，它只能傳達一些比較明晰的思想，而更深邃的思想只能是含糊其辭或詞不達意，以至與本來的意思面目全非了。

從這裏出發，德里達構建了他的理論體系：文字學代替符號學，文本代替書，文字有任人誤解的不可靠性，傳統便被這樣解構了。

應該說，德里達的文字學觀點是為了他的解構西方傳統的理論服務的。他認為，只要抽取了西方傳統的基石——即表音文字，西方的傳統就會轟然倒塌。為了尋求支持他的觀點的例證，他發現了東方的表意文字，並且十分契合他的反語音中心主義的觀點，因此他用東方的表意文字來反對西方表音文字，構築了他的理論體系。如果說，索緒爾只在西方的表音文字基礎上建立了他的語言結構理論是有其偏頗之處的，那麼，德里達的表意中心主義難道就是全面的麼？！

4. 塗爾幹、索緒爾和結構主義的發展

從前面的論述中我們可以認識到，結構主義思想雖然是在索緒爾那裏得到成形，而在後索緒爾時代得到發展和完善的，但是它的源頭卻可以追溯到塗爾幹時代。我們已經知道，在巴黎期間，塗爾幹的學說對索緒爾有相當大的影響，以致後來形成了以索緒爾為首的語言學的社會心理學派。

索緒爾和社會心理學派

在語言學史上，索緒爾不是劃在結構主義學派之中——結構主義是索緒爾之後產生的一種理論體系，它基本是沿用了索緒爾的理論體系，並有了很大的發展——而是屬於社會心理學派。這個學派又稱為法蘭西學派，代表人物除了索緒爾之外，還有法國語言學家梅耶和房德里耶斯。

岑麒祥先生在《普通語言學教程》譯本中曾有過這樣一段注釋，談到索緒爾曾接受了塗爾幹學說的影響：

²²轉引自陸楊，德里達——解構之維[M]，武漢：華中師範

大學出版社，1996，第24頁。

“索緒爾屬於社會心理學派，認為社會學就是社會心理學。他在這裏談到了語言學和許多毗鄰科學的關係，唯獨沒有談到語言學和物理學的關係，因為他把語言學的一切，連它的物質和機械的表現都看作是心理的。”²³

在《語言學史概要》一書中，岑麒祥先生繼續論述過這個問題：

“整體說來，心理社會學派的理論是以法國社會學家塗爾幹關於社會、社會發展、社會分化、民族與部族和原始社會性質等方面的理解為基礎的。例如，索緒爾、梅耶和房德里耶斯都把語言說成是‘社會事實’。什麼是‘社會事實’呢？他們對這個名詞是按照塗爾幹的理論去理解的。塗爾幹曾說過，‘集體生活……是由表像構成的’、‘社會就是觀念的總體’、社會學就是‘關於集體心理的一切’、‘集體心理學就是全部社會學’。根據這種理論去理解，因此在他們的心目中，所謂‘社會事實’其實就是一種心理現象——表像，而語言研究就是‘社會心理學的一部分’，語言研究純粹就是心理的。”²⁴

這種把語言看作是一種社會事實、一種社會心理現象在索緒爾的《教程》中隨處可見，尤其是關於語言性質的論述更集中地反映了索緒爾的這種心理主義傾向，如：

“言語活動的研究就包含著兩部分：一部分是主要的，它以實質上是社會的、不依賴於個人的語言為研究物件，這種研究純粹是心理的；另一部分是次要的，它是言語活動的個人部分，即言語，其中包括發音，為研究物件，它是心理物理的。”（《教程》第 41 頁）

這是談語言和言語的性質。從話語中抽象出來的語言系統是心理的反映，而實際話語活動（即言語）只是一種具有音響性質的物理-心理活動。又如：

“語言符號連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稱，而是概念和音響形象。後者不是物質的聲音，純粹是物理的東西，是這聲音的心理印跡。我們的感覺給我們印證的聲音表像，它是屬於感覺的，我們有時候把它叫做是‘物質的’，那只是在這個意義上說的，而是跟聯想的另一個要素，一般更抽象

的概念相對立而言的……因此語言符號是一種兩面的心理實體。”（《教程》第 101 頁）

語言的聲音不是物質的，而是心理的，那只是留在我們感覺中的一種心理印跡。語言符號連接的是一種心理印跡和一種符號概念，並不與實際直接發生聯繫，而是經過心理的過濾才形成的聯繫。

“類比是屬於心理方面的，但是這不足以把它和語音現象區別開來，因為語音現象也可以看作是屬於心理方面的（在《教程》第 211 頁上，索緒爾這樣說過，語音變化的原則純粹是心理的）……觀念在語音現象中沒有什麼作用，但類比必須有觀念參與其事。”（《教程》第 232 頁）

這是討論語言研究方法。語法是觀念的反映，是一種心理機制的反映，而語音則是心理印跡，兩者性質很不相同。

等等。

從上面的幾段論述可見，索緒爾根據塗爾幹的“集體生活……是表像構成的”，“集體心理學就是全部社會學”等理論，對語言的性質進行了解析。他把語言研究的物件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社會部分，即集體心理表像的語言系統，另一部分是個人心理部分，即個人語言。從這個原理出發，索緒爾將語言符號分為概念和音響形象，這一個音響形象不是實體（物質的），而是聲音的心理印跡，是一種觀念。既然如此，索緒爾建議建立一種屬於心理學的科學——符號學：

“我們可以想像，有一種在社會生活中研究符號生命的科學，它是構成社會心理學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普通心理學的一部分；我們把它叫做‘符號學’……語言學只是這個普通科學的一部分。”基於對語言本質的這種認識，索緒爾提出了語言是一個系統，言語和語言的對立引致共時與歷時的對立，主張，“共時與歷時這個觀點的對立是絕對的，不容許有所妥協。”從而構造出一整套完整的理論體系。

應該說，在塗爾幹那裏，心理學的影響僅僅是通過“集體意識”或“表像”等等術語隱含地表現出來。早期的塗爾幹曾嚴厲地批評將心理學和社會學混為一談的傾向，主張在社會學研究中排斥心理學的介入，這在他那本《社會學研究方法》一書中表現得特別明顯；雖然在他後期的一些著作中開始出現將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相提並論的情況，但是使用起來還是比較謹慎的。雖然

²³索緒爾. 普通语言学教程[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82, 第 27 页。

²⁴岑麒祥. 语言学史概要[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第 278 页。

今日的社會學的發展有將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混同的跡象，也有人主張社會學就是社會心理學，但是這些觀點都不能算在塗爾幹的頭上。而索緒爾就大為不同。因為語言和心理的關係實在是太緊密了。索緒爾將心理學大膽引入語言學，並宣稱語言學就是心理學的一部分，用心理學的觀念解釋語言現象。雖然今日語言學家普遍接受索緒爾及其後的結構主義理論，也承認索緒爾的理論對於認識語言和推進語言研究有很大的幫助，但對索緒爾把語言學併入心理學的極端主張大多不予贊同。應該說這是由於索緒爾所接受的心理學教育所使然，與今日的情況相當不同，所以並沒有受到廣泛的支持。

索緒爾的理論：革新和發展

歷史地來看，索緒爾的理論是一個革命性的理論，他首先衝破了歷史比較法和新語法學派的理論束縛，站在一個全新的角度對語言現象和語言理論進行認真地回顧和審視，並結合了社會學和心理學的理論思想，對語言學的理論體系進行了重構，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論原則和研究方法，而這些創新都是屬於索緒爾一個人的。這些理論原則和方法後來又成為語言研究的基本指導思想，正是如此，索緒爾一直被認作是語言學的理論和思想大師。

索緒爾的理論雖然是一個革命性的理論，但是他的理論卻是建築在前人的理論和方法上，並融合進了其他學科的理論成就，構造成一個完整的科學的理論體系。因此我們有必要考察一下索緒爾理論的承繼和發展。

索緒爾原本是屬於新語法學派的一員，接受的是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教育，因此考察索緒爾的理論，我們先應該看看索緒爾是從哪里進行突破和創新的。

新語法學派是歷史比較語言學的一個流派，其對語言的認識仍和歷史比較語言學大多數學派相似，即注重語言的演變規律，運用歷史主義的觀點去研究語言的各種現象，這是索緒爾接受語言學教育的基礎。雖然如此，索緒爾仍對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成績和不足有著清醒的認識。比如他就批評過歷史比較語言學是開闢了一塊豐饒的新田地，但沒有建成一門真正的語言科學，也批評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自然主義學派把語言看成生命體，將語言分成增長的或衰老的，批評他們僅使用比較方法，但認為單靠比較不能作出結論。索

緒爾認為，直到新語法學派問世，比較才獲得了正確的運用，因為“比較只是一種手段，一種重建事實的方法。”²⁵於是構擬原始母語成為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最終目標。這樣便形成了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核心觀念：原始母語的分化形成了親屬語，親屬語各語言間在不同程度上仍保留著原始母語的一些特徵，但說到底，這仍是生物進化論在語言學上的反映。

雖然歷史比較語言學在推動語言研究方面有過巨大的貢獻——正是由於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發展，語言學家們才將研究的視角從印歐語擴展到世界各種語言的比較上，但是它也存在著相當嚴重的缺陷。索緒爾的學生梅耶就批評說：“人們不可能通過比較構擬出一種消失的語言。”“比較語法的方法所提供的並不是古代口頭講的印歐語的重建，而是歷史上有文獻記錄的那些語言之間的一種有定的對應系統。”²⁶而且，就在歷史比較語言學最盛的19世紀，德國的羅曼語專家舒哈特也嚴厲地批判過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譜系樹”理論。他指責“譜系樹”理論無法解釋清楚為什麼一種語言只能分化為兩種語言而不能分化為多種語言，而且根據歷史比較法，循著時間越推向遠古，能夠發現的語言就越少也是不真實的虛構，而在歷史領域也找不到一種語言一定要分化為兩種語言這樣假設的任何證據。

歷史比較法的這些缺陷看來並不是索緒爾藉以創建“共時”與“歷時”這對概念的基礎。雖然萊普斯基調侃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索緒爾把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傳統（或明或暗地）觀點顛倒過來。”²⁷但索緒爾的結構理論也不是從歷史比較法的這些缺陷的角度出發來顛覆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相反，在《教程》一書中有相當多的篇幅都在談歷史比較語言學問題，整個第五編的五章全部都是歷史比較語言學問題。雖然索緒爾批評說：“這個學派（指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新語法學派）的貢獻雖然很大，我們卻不能說它對於全部問題都已經闡述得很清楚了。”²⁸實際上導致索

²⁵岑麒祥. 语言学史概要[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第23页。

²⁶A.Meillet: Introduction à l'étude comparative des langues indo-européennes, Paris, 1953, p41 et p47.

²⁷G.C.莱普斯基. 结构语言学通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第44页。

²⁸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82, 第25页。

緒爾的歷時與共時概念產生的真正源頭是對語言是一個獨立的系統的看法中誕生的，而不是上述關於譜系和構擬等問題的缺陷。

索緒爾對歷史比較法也有他的不同看法。從根本上來說，索緒爾一直把自己認作是新語法學派的人物，同時也是歷史比較語言學家。這從他在教授普通語言學課程前一直在巴黎和日內瓦大學教授梵語和歷史比較法課程的經歷就可以看得出來。在他的《教程》中，他對歷史比較法的批評是很緩和的，完全不像他的學生那樣對歷史比較法的批評不僅言辭激烈，而且幾乎是全盤否定歷史比較法的功績。他對歷史比較法是有些意見，不過這些意見最多只能用不滿來形容，而不能用否定來解說，他想對歷史比較法進行修正和革新，但是可能他做夢也想不到，他所革新的這個理論，不僅催生出了一個嶄新的哲學流派，而且徹底顛覆了歷史比較法在語言學中的統治地位，進而形成了以他的共時理論中所闡發的系統或結構的概念為基礎的結構主義的風行。

導致索緒爾對歷史比較法不滿的是他認為歷史比較語言學只是研究語言的片斷（比如某種語言的語音對應規律，或是某種語法範疇的歷史演變等），而他認為當時的語言學界學應該用一種全景式的眼光來認識一種具體的語言：“我們要集中在某一個狀態才能把它加以描寫或確定使用規範。”要是語言學家老是跟著語言演化轉，就好像在法國的汝拉山看對面的阿爾卑斯山一樣，看不清全貌。²⁹這樣就形成了索緒爾的歷時和共時概念的區分：“有關語言學的靜態方面的一切都是共時的，有關演化的一切都是歷時的。”³⁰

於是索緒爾批評道：“在歷時的展望中，人們要處理的是跟系統毫不相干的現象，儘管這些現象制約著系統。”³¹接著，索緒爾就開始宣佈他的一個最重要的觀點：

“語言是一個系統，它的任何部分都可以而且應該從他們的共時的連帶關係方面去考慮。”³²

這是一個新哲學思想的誕生的口號。系統的概念出現了，關係取代了過去哲學中的“實體”

或“客體”。語言既然是一個系統，需要用共時的方法來研究語言間的關係，於是共時的研究就應該成為語言研究的主宰，統治語言學一百多年的歷史比較法就應退居到二線。語言學發生了革命，系統地或共時的研究成為語言研究的主流。

歷史比較語言學就這樣被顛覆了，系統和關係的概念產生了，隨之一系列結構主義概念奔湧而出，結構主義在索緒爾的講堂裏誕生了。皮亞傑曾用簡約的語言描述了這場索緒爾革命的本質：“在連續幾代的語言學家中，結構主義主要是把加在孤立現象之上的歷時性研究拋在腦後，用共時性的理論去找出語言的整體系統來。”³³

好一個整體系統！在這裏我們又看到了塗爾幹的影子。

皮亞傑在整理結構主義的特徵時提到了三個它的特點：整體性、轉換性和自身調整性。其中整體性是結構主義的一個顯著特徵。而我們在前面看到，而正是塗爾幹將整體性移植到社會學的研究中，才使社會學的研究有了極大的進步，而我們也意識到，索緒爾的系統觀也和塗爾幹的整體觀有關聯，這是與索緒爾所接受的塗爾幹的社會學學說有密切聯繫。

我們知道，塗爾幹提倡一種從整體、從全局的角度來考察社會事實的方法，並採用了統計學中的多變數分析來進行這種全景式的研究。其中，以“整體大於部分之和”最為鮮明地顯示出塗爾幹的整體論的特色。整體是由部分組合而成的，但是，當部分整合為整體之後，整體便作為一個系統而獨立存在，各部分在整體間都相互聯繫、相互制約，彼此不可分割。社會學強調社會現象的普遍的聯繫性，每種社會現象都與其他現象有著程度不同的聯繫，正是這種整體論的反映。

塗爾幹的整體論在索緒爾的理論中被稱為系統。而索緒爾的系統是從價值這個概念中生髮出來的。價值的概念，在索緒爾的理論中是屬於共時範疇的。那麼，索緒爾的價值是什麼意思呢？索緒爾舉了一個例子，說，在下棋的時候，一個棋子壞了或丟了，可以換上一個等價物，不管換上的是棋子，還是其他什麼東西，只要授以相同的價值，照樣可以宣佈它們是同一個東西。這是索緒爾的共時理論的同一性問題。他還舉了一個

²⁹索緒爾. 普通語言學教程[M]. 上海: 商務印書館, 1982, 第 120 頁。

³⁰索緒爾. 普通語言學教程[M]. 上海: 商務印書館, 1982 第 119 頁。

³¹索緒爾. 普通語言學教程[M]. 上海: 商務印書館, 1982

³²索緒爾. 普通語言學教程[M]. 上海: 商務印書館, 1982, 第 125 頁。

³³皮亞傑. 結構主義[M]. 上海: 商務印書館, 1996, 第 1 頁。

例子說明這種同一性問題，例如，每天晚上 8:45 分從日內瓦發往巴黎的列車，儘管每天的乘客都不一樣，可是還是同一輛車。索緒爾於是指出，這種價值就是指“兩種不同事物之間對等著的系統。”實際上這就是後來所說的能指和所指。但是就語言而言，語言學的能指（也就是價值）不僅有與概念（即意義）對立的一面，而且還帶有物質的一面。這就是“音義結合體”的特性。所以，“一個詞成為一個系統的一部分之後他就不只有一個意義，而且還有一個附加的價值。”比如法語的 mouton（羊，羊肉）在意義上可以和英語的 sheep（羊）相類似，但價值不同。因為法語的 mouton 有“羊”和“羊肉”兩個意思，而英語的 sheep 只有“羊”的意義，“羊肉”這個概念得用另一個詞來表現——mutton。還有一種情況，法語的 redouter（恐懼）的近義詞系統有 craindre（怕）、avoir peur（害怕），各詞義彼此對立才能顯示出自己的價值，缺失了 redouter，上述的系統就可能發生變化。這就是語言的價值，說白了就是系統。上述兩個例子就是表明語言存在著一個辭彙或語義系統。不同語言的辭彙系統和語義系統都不一樣，所以語言間存在著價值差異。

應該值得注意的是，索緒爾在這種價值問題上很強調對立面的不同，這在系統論中是很獨特的。一般說來，塗爾幹的整體論強調的是整體內部的各部分是相互聯繫和相互制約的，所以整體保持著平衡。索緒爾的系統論除了繼續強調系統內部的相互聯繫和相互制約外，還特意提出，系統內部的各部分也相互對立，也相互聯繫，將系統內部的部分的聯繫用對立和統一的概念聯繫在一起，形成了他的理論的最大特色。因為只有對立才能顯示系統各部分的獨立性，然而這種獨立性是被系統統一在系統內部，所以整個系統又顯得相互制約，以達到平衡。這是索緒爾對塗爾幹的整體論的進一步發展。既獨立，又統一，這就是索緒爾的系統理論的結構特色。正因為系統內不僅存在相互聯繫並相互制約的關係，而且還有相對的獨立性，因此，系統一旦遭到破壞，系統會以另外一種相互聯繫來重構平衡系統，保證系統的完整性。社會系統遭到破壞，系統內部會重建系統，以求達到新的平衡——這就是塗爾幹的結構功能主義的主要特色，語言也有這種情況，語言系統有缺失的部分，就會有相應的補充成分

來頂替它。這就是系統平衡的主要功能。

索緒爾在創建了價值—系統理論之後，又根據二項對立的原則，解析了若干個重要的基本概念，完成了後來被稱為結構主義的基本框架的建構。可是要知道，索緒爾所創立的這個新理論只是共時語言學的主要部分，此外，索緒爾還在歷時語言學、歷史比較語言學、語言地理學、內部語言和外部語言等方面有許多卓越的論述。奇怪的是，索緒爾的共時理論被其後的繼承者大大地發展並光大了，而其他理論卻少有研究。哲學界和文學界很少觸及這些非共時理論大約是因為這些理論專業性較強，不便作跨學科研究；而語言學界也很少研究這些理論卻是令人不解的。尤其是近些年來，語言學界批判索緒爾的學說是靜止的、片面的研究語言，卻忘記了索緒爾說過“外部語言學研究的卻是一種很重要的東西。”³⁴固然，在《教程》一書中，索緒爾為了反對歷史比較語言學只提倡比較而不管描寫的傾向，著意創建語言靜態描寫的基本原則，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需的；但是卻不能拿今日的理論觀點和現實情況去苛求前人。研究歷史人物必須遵循“歷史主義”的原則，從當時當地的情況出發去研究和探討，而不能不顧歷史的實際情況，用今天的情況來詮釋歷史。何況索緒爾並沒有全盤否定外部環境對語言系統的影響，他只是強調語言系統可以擺脫社會環境的制約獨自研究，這點是結構主義的一個基本公設：“一個結構本身是自足的，理解一個結構不要求助於同它本性無關的任何因素。”³⁵如果連這點都不允許的話，結構主義也就產生不出來了。何況從索緒爾的論述中我們也知道，當時就有人提倡社會環境和語言系統一體研究的必要性，社會語言學也只不過是歷史上的一種觀念的延伸和發展，並不是什麼新鮮玩意。

結構主義的發展

索緒爾之後，索緒爾的創建的理論逐漸以結構主義的名義在歐洲和美洲傳播開來，並逐漸形成了布拉格學派、哥本哈根學派、美國學派、功能學派以及轉換學派。法國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

³⁴索緒爾. 普通語言學教程[M]. 上海: 商務印書館, 1982, 第 43 頁。

³⁵皮亞杰. 結構主義[M]. 上海: 商務印書館, 1996, 第 2 頁。

斯以布拉格學派的音位理論為基礎創建了結構人類學，從而將結構主義擴展到語言學之外，其後又逐漸傳播到文學、哲學、社會學和心理學，從而在人文社會科學中掀起了一場結構主義運動。發展到今天，結構主義又遇到了新的挑戰，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在批判結構主義的過程中發展為一場以“顛覆”和“超越”為名義的學術革命，其前景頗難逆料。下面，我們介紹幾個主要的結構主義語言學派。

布拉格學派

布拉格學派于莫斯科語言學派有著密切的淵源關係。十月革命後，莫斯科語言學派的骨幹：雅各遜（R. Jakobson）、特魯別斯科依（N. S. Trubeckoj）先後流亡出國，先到達了布拉格，後定居維也納，以教授斯拉夫語文學為業。他們提出的一系列理論主張成為布拉格學派的基本觀點。

布拉格學派的學術特點是特別重視語言功能的研究。為此，他們借用了索緒爾的“音位”（phoneme）這個術語而賦予的不同于索緒爾的意義。索緒爾的“音位”指的是最小的語音單位，即“音素”；而布拉格學派的“音位”是從功能上考慮的，音位的定義為：最小的、有區別意義功能的單位，這也是目前“音位”這一術語的基本含義。前面我們在討論索緒爾的理論思想時也提到，索緒爾的理論思想中已經出現的功能的概念，這個思想在布拉格學派中得到了發展。他們將索緒爾“語言是一種系統”改為“語言是一種功能系統”，並聲稱，語言是人類有目的的行為的產物，這個行為就是實現主體的表達與交際，這就是布拉格學派對功能的解釋。此外，在語言描寫的原則上，布拉格學派也突破了幾處索緒爾設立的禁區。比如索緒爾認為，比較是歷時的，描寫是共時的；而布拉格學派則認為，比較不僅應應用於歷時的目的，而且必須用於共時的目的；又比如，索緒爾認為，共時描寫不需要引入演變的概念，而布拉格學派則主張共時描寫也有必要引入演變的概念，以及派生與非派生等概念。布拉格學派的另一大特點是十分重視對文學語言和詩歌語言的研究，這是列維·斯特勞斯可以借此構建他的神話學和結構人類學的基礎。

布拉格學派的代表人物除了原莫斯科語言學會的特魯別斯科依之外，其他的代表人物有馬特休斯（V. Mathesius, 捷克人）、鐘斯（D. Jones,

英國人）、本文尼斯特（E. Benveniste, 法國人）、馬丁內（A. Martinet, 法國人）等歐洲語言學家。

哥本哈根學派

這個學派又稱語符學派。代表人物是布龍達爾（V. Brøndal, 丹麥人）和葉爾姆斯列夫（L. Hjelmslev, 丹麥人）。這個學派繼承了索緒爾的理論，並以嚴格的態度發展了索緒爾的學說，成為歐洲結構主義學派中“後”索緒爾學派。這個學派的理論頗為艱深，絕大多數論及的是語言哲學問題，尤其以邏輯哲學最為引人注目。

這個學派的理論主張與索緒爾的“語言是一個獨立系統”有密切聯繫。他們認為，語言學理論必須是內在的、自足的整體，解釋語言必須用語言學本身的術語，而不能使用非語言學術語來解釋；語言學理論必須是一個純演繹系統，其理論本身必須獨立於任何經驗之外；理論的目的在於提供一種程式方法，可借此描述一些物件，而描寫則必須是經驗主義的，其特徵應該是本身一致、可窮盡的和盡可能地簡單。

和其他結構主義學派相比，這個學派的理論原則則極為嚴格。比如，他們對索緒爾的能指與所指這對範疇又進行了進一步的細分，他們分別把它劃分為四個層次：內容形式和表達形式、內容實體和表達實體，並宣稱，形式和實體的劃分對於一切科學來說都是正確的，而表達和內容則是一切符號學（包括語言學）所特有的。這個學派發展了索緒爾的關係學說，宣稱，科學分析的真正物件不是事物，而是關係，即功能。事物本身不是別的，是關係的交叉、功能的終端，即功能成分。功能分為三種：從屬、限定、並列。這三種功能根據它們能否成為“過程”或“系統”的一部分，都有不同的指稱。

這個學派也在符號學研究上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他們之所以被稱為“語符學派”是因為他們大大地發展了索緒爾的符號學說，並認為一種語言只有把它的外在功能、它和非語言因素的關係都考慮進去才是一種符號系統。而語言則是一種能夠從有限的非符號產生出無限量的符號的符型（figurea）系統。因此，根據上述的能指/所指以及符型理論，這個學派將符號學分為多種內容：以內容平面為符號學的叫純理符號學（metasemiotic），以表達平面為符號學的叫內涵符號學（connotative semiotic），不以任何平面為符號學的叫外延符號學（denotative

semiotic)。語言學屬於純理符號學。同時他們又根據“操作性”，又將純理符號學分為普通符號學和純理普通符號學。

總之，這個學派大大發展了索緒爾的理論，並對符號學的發展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不過由於這個學派一直醉心於理論建設，對語言的實際操作並沒有提出多少可行的觀念和方法，妨礙了這個學派的發展和觀念的普及。

美國學派（描寫主義）

美國的學術傳統是實用主義。和歐洲的思辨傳統不同，在美國本土上發展起來的學術觀點都很注重實際操作性。美國的社會學派如此，結構主義的美國學派亦然。

美國本土的語言學派和美國的人類學有著密切的聯繫。這是因為美國的土著語言（印第安語）和印歐語大不相同，並且還缺乏研究資料。大量的工作需語言學家親自調查，因此如何分析一種陌生的語言成為美國語言學家最極為迫切解決的問題。

最早進行印第安語調查的是美國人類學家鮑亞士（F. Boas）。他親自主持了“美洲印第安語調查”這個研究項目，並延請了當時許多的語言學家參加。最終的結果是出版了《美洲印第安語手冊》，這是關於美洲印第安語第一本最權威的著作，從這本著作中，我們可以感到美國語言學的一個顯著特徵，那就是對語言的共時描寫的興趣遠遠超過對歷時比較的興趣，因此，美國的結構主義又被稱為描寫學派。

美國描寫學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布龍菲爾德（L. Bloomfield）。他是個行為主義者，他認為，語言是刺激—反應的結果，這是典型的行為主義心理學的看法。刺激引起了說話（R），說話刺激了對方（r），這種反應又變成一種替代性刺激（s），最終引起對方的實質性的反應（S）。因此，在布龍菲爾德的理論中，意義的研究被排除了，語言研究的先決條件是語言的特性和穩固的狀態。也就是說，語言學的基本假設是，在一定的社會中，某些言語—話語，就其形式和意義來說都是相同的。

比起語言性質研究來，布龍菲爾德的操作性理論更普遍受到歡迎。原因是他提供了一系列分析語言有用的原則和方法，這些方法至今仍在被廣泛地應用於實際的語言分析研究上。布龍菲爾德提出的主要原則和方法有：分析語法成分的

“直接成分分析法”、關於音素的理論、關於詞素的粘附形式和自由形式、音位—法位理論、類型學和語言的變異現象等。由於這些理論和方法被語言研究者廣泛採用，所以美國的描寫主義是現今在語言學界中最通行的一種結構主義學派，其影響也遠遠超過了其他結構主義學派，成為了一種最典型、最普及的結構主義學派。雖然其理論現在也遭到了不少非議，但是從其可操作性角度來看，現行的任何一個結構主義流派仍無出其右。

生成—轉換語法

這個學派是最晚出的結構主義語言學派，在這個學派之後，再也沒有產生新的結構主義學派。接替的是社會語言學的誕生和後結構主義的產生。這個學派也和同時代產生的社會學的巨型理論（帕森斯，T. Parsons）一樣，一反美國學術的實用主義傳統，在宏觀理論建構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但缺乏可操作性。雖然近些年來的研究在逐漸增強其理論的可操作性，但距離實用還差得很遠。

生成—轉換語法的創始人是美國語言學家喬姆斯基（A. N. Chomsky）。他所創立的學說具有不同於以往任何語言學派的特點，那就是形式化。語法規律可用一系列的公式或枝形圖表達出來。這就為數理語言學和電腦科學的發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平臺。因此喬姆斯基的理論在數理和科技領域有著廣泛的應用，這也為語言學獲得了最具科學性的人文社會科學的領先學科的聲譽。以致語言學和數學一樣成為人文—社會科學和科技等學科之間的一個共同的基礎。

生成—轉換語法對語言的看法不是語言行為，而是語言能力。喬姆斯基認為，我們所能說出的句子是無限的，語言運用的模式是有限的，從有限的模式產生無限的句子是人類所特有的能力。實際上這也是在詮釋索緒爾語言／言語的理論，因為索緒爾也有類似的看法。但是喬姆斯基進了一步，他批評說，對任何著重於語言素材的描寫和分類的企圖都是無用的，需要分析的是語言能力。而這種能力是先天的，是人類種群所獨有的。因此語言能力具有普遍性，適用於人類全部語言活動，不受空間和時間的限制。

根據這個理論，喬姆斯基制定了一系列的原則。他把語言結構分為兩個平面：語義平面和語音平面。從語義平面到語音平面要經過一系列的

轉換程式（實際就是語法規則）才能生成出一個合法的句子來。用通俗的話來講，語義平面就是內容，即所指；語音平面就是表達，即能指。連接內容和表達的是轉換規則（語法）。這些便構成了喬姆斯基的生成一轉換語法的核心。喬姆斯基的轉換規則既複雜又專業，這裏就無須多說了。

總起來說，結構主義思想是發端于塗爾幹，經過索緒爾的理論化和系統化，形成了結構主義的基本框架，而後又經過各種結構主義學派的豐富、革新和發展，形成了一種理論嚴密、方法精確的科學理論，成為人文社會科學中的科學一理

性主義的理論基礎。但是，結構主義理論也存在著明顯的不足，一是它僅側重于共時描寫，而不注重歷時比較；二是它的理論要求對結構的描寫必須在系統內部進行，而無需引入外界的影響。這種孤立的和靜止的研究是其後社會語言學興起的必然結果。

作者簡介:

Liu Yuanchao（劉援朝），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人類學研究所。